

试论早期现代化推进力量配置中的矛盾性 ——以张謇为个案的分析

严翊君

(江苏省行政学院 社会学部, 江苏南京 210004)

摘要: 中国早期资产阶级配置现代化推进力量的过程,是一个国家、地方、民众间极为独特的互动过程,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以张謇为例,为了赢得进行现代化探索和实践的自由,他辞官不就,以道抗势,力倡自治,实行权力抗衡。尽管因此争得不少权力,但对于推动一个地区的现代化还是显得十分“弱势”。张謇要具备“强势”,只得另行出路。他在“以道抗势”的同时,不得不时常低下孤高的头,“以道附势”。当张謇为抗势和附势交相为用费尽心机,还不足以使自己的力量壮大的时候,他并没有看到一个巨大的动力源就在他的身边,那就是民众。从而丢失了自治的民主内核,闭锁了自治的动力机制。

关键词: 以道抗势;以道附势;动力机制;闭锁

中国早期资产阶级配置现代化推进力量的过程,是一个国家、地方、民众间极为独特的互动过程,这种特殊性,使早期资产阶级常常陷入深深的矛盾中,终至没有足够的力量和能耐把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航船驶向成功的彼岸。这里,我们以张謇为个案,展开这一方面的分析。

张謇推进现代化的力量配置是:圣贤式的精英+无法避开的官僚国家+徒有“自治”之名的乡绅。这种力量配置使他屡屡陷于尴尬局面。他既没有政府权力,又没有像西方那样深厚的市民阶级基础,他只是一介抱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寒士”。但是,他又必须充当启动区域现代化的领导者,这使他常常“仰天俯地,一筹莫展”,最终选择了“以道抗势”与“以道附势”交相为用的行为方式,以取得一种非正式权力,赢得和保持领导位势。同时,由于他始终认为“民智未

开”,他认定推动他所创造的事业的,除了“倔强一夫”,即他自己,只有“二三兄弟弟子”。^①毋庸讳言,要把传统的沉痾启动起来并顺利地驶向现代化目标,必须要有强大的力量。张謇及其少数精英只是“勉为其难的早期现代化主导力量”。^②

一、“以道抗势”和“权力颀颀”

1. “以道抗势”:赢得现代化实践的自由

张謇充当南通区域现代化的启动者和领导人,是从以道抗势开始的。儒士以道抗势的价值依据是孔孟的“谋道”理论。孔孟较强调对属于最高理想和终极关怀的“道”的追求,不过多考虑王权的政治态度和行为准则。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③“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④。于是一批有道之儒不愿入仕,甘以落魄寒士自居。据历史记载,儒士以道抗势有不同的方

收稿日期:2002-08-20

作者简介:严翊君(1953-),女,江苏南京人,江苏省行政学院教授,博士。

式。一种是隐遁山林。另一种是私立学院,私门授学,私门养士,“提供非官方意识形态话语资源的功能。”^⑤张謇以道抗势,与这两种情况都不同。他的方式是辞官不就,“退避江海小邑”,搞“工业救国”,“教育救国”,营“地方自治”,建“新新世界雏型”。

然而,张謇的抗势是悲剧性的,是不得不作出的选择。1894年他荣中状元,本可以沿着翰林至大学士的坦途进入国家权力中枢,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作用。但是,正如他自己所感叹的:“謇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⑥,中国的政府权威使他感到失望。他不得不多次离开宦海而自营其志。

众所周知,由于传统社会关系的逐步瓦解,社会主体从人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推动原初型现代化的社会力量主要包括工商资本家、新贵族、以及小商人和自由民。就像马克思指出的,“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⑦。但是,由于后发型国家缺乏现代性因素的积累,由民间力量来启动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只有运用国家机器的强大力量来推进。因此,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其前提几乎无例外地都是相应的政治变革,确定政府的现代化取向。俄国的彼得大帝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导致两国现代化的前提。美国的兰比尔·沃拉在谈到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失败时说,在中国,“中央政府的权威及策略手段都极为有限。……无法使自己发挥协调全国现代化所必要的统一作用。”^⑧日本的富永健一认为,辛亥革命以后,“身居中央权力政府之要职”的袁世凯、段琪瑞等人“没有任何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意识”。孙中山也只是一个软弱的革命家,不是强有力的现代化推进者。中国现代化的结局可想而知。^⑨

正因为这种特殊性,一心要使中国变为“新新世界”的张謇,觉得国家权威“暗蔽不足与谋”,只能选择以道抗势的行为方式,以赢得一点现代化探索和实践的自由。他说:“治本维何?即各人抱村落主义,自治其地方之谓也。今人民痛苦极矣,求援于政府,政府顽固如此;求援于社会,社会腐败如彼。然则直接解救人民之痛苦,舍自治岂有他哉!”^⑩是因为“政府腐败如彼”,所以他才“尤无求于政府”^⑪,自营其志。

2. 辞官不就和试诸村落

张謇以道抗势的直接表现就是辞官。辞官,是张謇生命旅程中的一道风景线,他一生不知辞过多少次官。比较重要的有三次。第一次:1894年4月,张謇点中状元当上翰林院修撰,到1898年6月辞职,扣除父丧守制的时间,在官共120天。张謇说:“謇天生野性,本无官情”,这不一定全是真话。张謇通过层层叠叠的考试,最终蟾宫折桂成为状元,说不想当官是不合情理的。但因甲午马关之辱;卷入宫廷党争,屡屡险境;朝廷腐败无能,抱负难以施展,使他满腔宦海奢望顿时冷却,报国之志,治国之策,统统埋藏心底。同时西方文明的冲击,经营乡里和办纱厂的实践,已使他找到了补偿由仕途失意而带来的价值失落的方式。第二次:从1912年1月3日孙中山聘张謇为实业总长,到当年2月12日正式辞职,前后不过40天。深层次的原因是“道”不合,崇尚实用的张謇对孙中山“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的说法,觉得“未知涯畔”;对临时政府因财政困难而把汉冶萍向日本抵借借款,不可原谅;汉冶萍之事又纯由孙中山、黄兴作主,作为实业总长的张謇未能参与决策,感到有名无实。^⑫第三次:1912年正月,袁世凯当临时总统。1913年,熊希龄当总理,几次电请张謇任农商总长,先辞,后于10月就任。1915年11月辞职,前后两年,算是任职时间最长的。在当时,张謇任农商总长,可说是最佳人选。张謇锐意改革,颇想有所作为。但是,袁世凯忙于复辟帝制,张謇在农商总长任上的多方努力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这使张謇对袁世凯政权极为失望,坚决辞职。^⑬

张謇以道抗势的主要方式,是把当局不予重视但他认为重要的谋虑试诸村落,他自称“村落主义”。实质是在地方推行现代性试验。他说:“下走生平所志,十不得一施。约诸地方,试诸村落,以是自娱,亦犹焚货贿者之弄兵,挠国是者之舞智,自行其心之所明而已。”^⑭试举几例:清末废科举、兴学堂时,有的地方只注重办大学堂,张謇认为应从小学普及抓起,上书刘坤一,不予采纳。他就在南通办师范,为普及小学培养师资。他写《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国博览馆议》和《上学部请设博览馆议》,建议成立帝国博览馆,不被重视。他便在南通建图书馆、博物苑。他写《奖励植棉暨纺织业说》陈于清农工商部,结果,“略供

全部三数人酒半茶余之谈助而已”^⑤。他只得在通海地区兴办垦植。总之,凡是政府不予采纳、搁置不理但中国的发展需要的远谋,他就利用他实业家和士绅领袖的双重身份,行之于南通。

3. 权力颀颀的跃跃欲试

张謇虽然公开以道抗势,但是,他要办成现代化的事业,必须要有权力的支持,而“十不得一施”的状况,也都来自权力拥有者的阻拦和暧昧。于是,通过某种合法的手段,实现权力抗衡,一度成了他的奋斗目标。

权力抗衡的前提是要建立自身的权力。建立自身权力并非超越自身身份的权力僭越,而是符合自身身份的合法性权力获得,那就是实行国家与经济社会的分离,使国家把属于经济社会本身的权力交还给社会。这是西方市民阶层得以壮大的一个重大前提。张謇也试图走这一条路。但在张謇那里则是地方自治与政府治理的分离。由于中国处于转型的早期,并不存在一个市民阶层,张謇认为地方自治的主体就是地方绅士。他谴责中国数百年来不准士绅干预地方公事的旧规,认为这一传统导致“行政人与社会,几几如冰炭之不复相入,以演成今日之现象。”^⑥张謇所称的“社会”,就是指的绅界;这里的所谓“悬隔”,是指政府大权独揽,专制主义。他认为,“日本勃兴,其最初之起点,由社会影响所被者为多。”而中国则是“行政人”摧折“社会”,“反对社会”,甚至“解散社会”。他强烈要求“政府与社会合”,这里的“合”,首先是指权力的分离,然后才是“合”,即合治。他说,立宪制度应是“社会处立法之地位,地方官处执法之地位”,“官与绅共其责成”;^⑦他认为,“今天朝廷既已宣布九年(1920年)立宪,社会将与政府合,有社会乃有政府”^⑧,政府与社会应处于一种既相联合又相抗衡的互动关系,“社会监察政府,政府也监察社会”,^⑨亦即官权与绅权,官治与绅治既能相颀相颀而又相辅相成。

张謇建立自身权力的主要途径是地方自治。1908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之后,张謇公开举出地方自治的大旗。就全国而言,当时的所谓地方自治会多数流于形式,张謇却把它的作用发挥到极点。以张謇为首的南通地方精英集团通过一些地方自治组织来实现对南通的实际控制。通崇海泰商务总会与上海、南京、苏州总商

会并列为江苏四总会,该会成立于1904年,范围遍及南通、海门、如皋、崇明、泰县、泰兴、东台等数县商务,会员多达数万人。自成立直至20年代中期,该会正副会长始终掌握在张謇兄弟和其他大生企业领导人之手,其职能包括联络工商,调查商情,受理商事纠纷,保护工商业利益等,实际独揽大通海地区的工商管理大权。商会虽在地位上较同级行政组织为低,而实际权力却足以与后者相颀颀。^⑩由于张謇的个人威信,加上地方自治组织实际成长起来的权势,地方官到任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访张謇,甚至南通警察厅厅长办案也常向张謇请示。^⑪

1920年,张謇和张孝若还组织了南通自治会,张孝若任会长,其内部机构设置、职权分工与地方政府很相仿佛,大权掌握在上层绅商手中。由于张謇的实力雄厚,南通自治会喊出“自存立,自生活,自保卫”的口号,并打算发行公债200万支持地方事业的发展。^⑫张謇公开说:“地方募公债,非政府募公债;政府不还钱,无处讨,地方不还钱,有处讨。”表现了对政府权威的挑战。日本人驹井德三曾这样描述张謇的权威:“今江北一带,仿佛以张公为元首之国”,“要之,张謇对于现在中国之政界,表面上虽无何等之关系,然以张公在经济上、地方政治上有坚固之基础,不仅大总统及现任内阁,即地方政府也无如之何也。张公虽甚持重自下,然在中国政界之潜势力,可谓不薄。”^⑬也就是说,张謇在经济和地方自治上的基础奠定了他在政治上的潜势力;这种潜势力又反过来支撑了他的地方自治事业。

当张謇的“新新世界的雏型”处于最兴旺时,他已不满足于仅仅在通海地区独树一帜,而希望把整个江苏纳入他所追求的地方自治轨道。1919年9月张謇和江苏一批绅商筹划在上海设立“中华模范地方自治讲习所”,当时掌握北京政府的皖系军阀害怕地方势力增长,断然拒绝。^⑭1920年,张謇发起成立“苏社”,主张“苏人治苏”,“人人执自治之心,实不必依赖省长。”^⑮江苏省政府采取了软拖的方法,使其“苏人治苏”的要求被迫取消。

事实上,当时掌握北京政权的军阀可以利用张謇的模范县来装点门面,故允许张謇在南通发展,但绝不允许其把范围扩大到整个江苏甚至更

大的范围。其实,张謇和当时中国的其他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样,因为没有西方那种坚实而深厚的市民社会基础,他远没有像西方的资产阶级那样觊觎政治权力,僭越政治权力,最后成为政治权力的拥有者的雄心。“张謇的地方自治目标,其出发点不是要在政治上建立一个与中央权威相抗衡的由个人主宰的地方独立王国”。^②为了表明这一点,致力于教育的张謇,在人才的培养上,也只注重农工商实业人才,而无意于法政军事人才。^③

尽管张謇通过自治组织已争得不少权力,但对于推动一个地区的现代化还是显得十分“弱势”。张謇要具备“强势”,只得另寻出路。他在“以道抗势”的同时,不得时常低下他孤高的头,“以道附势”。因此,他虽然不屑于做官,但似乎从来都没有脱离过与官府的干系,从来没有蜕去对国家和官府的依附色调;他虽然“最恨世俗的见解”,^④但时常又不得不行俗套,疲命周旋于官府之间。他似乎进入了一个迷阵,转悠了半天,还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

二、迫于无奈的“以道附势”

1. 以“通官商之邮”的方式强化自身力量

张謇处理与政府关系的心态是极为矛盾的。从内心讲,他对“政府腐败如彼”早已深恶痛绝,他追踪“三代”,实际上是对当朝政府的否定。但是,现实又一步步把他逼上对国家和官府的依附地位。他要推动南通区域现代化,就必须通过以道附势的方式来强化自身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最初,张謇虽受洋务派人物张之洞的奏派而开始走上办实业的道路,但他并没有照洋务派的方式去办实业,而是以否定洋务派的全新的姿态出现的。否定的切入点就是反对“官控”,坚持以“商办”、“民营”的形式办企业。洋务派办实业,经历了官办、官督民办、官商合办三个阶段,但是,无论采取怎样的形式,清政府卷入各种工业,都带来了极大的弊端。“无事不由官总其成,官有权,商无权,势不至本集自商,利散于官不止。”^⑤“官僚机构的腐败和行政效率的低下,大大地减少了某些企业的利润,造成了另一些企业的失败。”^⑥张謇对洋务运动的这些缺陷早有觉察。早在1879年,他就批评洋务派:“洋务之空

谈”,“自强之无实”^⑦。他批评李鸿章:“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为大言,胁迫朝野”^⑧。因此张謇主张摆脱官控,走民营的道路。从大生纱厂《章程》第一条,可以看到张謇想摆脱官控的清晰思路。这一条写着:“厂系商本,未领官款,厂中诸事应请听商自便。惟主持保护官绅,是求将来如有必须变通之事及可以扩充之时,应请官绅主持保护属下情达。”^⑨这是明确在向官方申明要脱离其控制。

但是,以现代工业方式搞实业,远非他当年经营乡里那么容易,最大的问题是资本的来源。由于最初集资的极端困难,最后不得不领了官机,^⑩折合25万两作为官股。另筹到19.51万两地方和民间资本。国家股占大头,看来仍然逃不脱“官管”的命运。但是,机巧的张謇与张之洞、刘坤一商量,不以“官商合办”的形式而以“绅领商办”(绅士领导的民营)的形式。这一变动实质在于创造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现代形式的雏形,张謇成了实际上的国有资产的委托代替人,否定了官方直接插手企业的形式。台湾中央研究院林明德先生说:“‘实业救国’这一口号,并非只是借口,而是借民间企业经营的实践这一点,实为张謇的第一功绩。中国企业经营的方向,从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转到商办的背后,实有张謇的努力和辛苦。”^⑪

尽管如此,终归还是没有脱掉与政府的干系。实践中他进一步悟出,在中国搞现代化,离开了官府还不行。于是,一方面,他尽可能地回避官场对企业的正面干预,另一方面,张謇自谓“通官商之邮”,对官,他是商界领袖,利用商人群体的诉求和支持,可以一争权益;对商,他有“状元”、“奉旨总理通海商务”、“农商总长”等头衔,依恃官府的权威,平抑来自地方保守势力的阻挠,并尽可能利用来自官方的有利因素,控制南通区域现代化进程中所必须的物质资源(土地、商业财富、军事力量等)、社会资源(社会影响力的关系纽带、家族群体、结社等)、个人资源(专长技能、领导能力等)、象征资源(名分、名望、特殊生活方式等)。

2. “以道附势”的酸甜苦辣

张謇终于为增强自身的力量而不得不“以道附势”,为此他尝到了甜头,也吃足了苦头。他的

附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利用潜在之势。张謇一生中真正任实缺官的时间不过三四年的光景,自嘲“在官半日”,也称“不愿居八命九命之官”。足见其对世俗官场看得比较透彻。但是张謇为了壮大自身的力量,一面不断地辞官,一面又不断地接受和担任一些短期官职和虚衔。并把因此带来的荣誉和荣耀,转化为一种官场潜势力。张謇本人虽未曾直接进入政治权力核心,但先后参与和介入过清末民初中国所发生的几乎所有重大的政治事件和活动,在张謇的头上,也始终闪烁着来自官方的各种耀眼的桂冠,如:“状元张謇”、“张殿撰”、“奉旨总理”、两江商务局总理、学部咨议官、商部头等顾问官、江苏教育会会长、江苏咨议局议长、农工商部大臣、两淮盐政总理、农商部总长、全国水利局总裁等。这些多数是虚职,实职的任期都极为短暂,但这里却潜藏着王朝和官府的势力。这种潜势力,不仅可以带来象征资源,如提高他在官场士林的声誉,壮大他在地方社会的声望,还可直接带来物质资源和其他的社会资源,为他的南通地方事业创造了极其有利的社会条件。在大生纱厂起步时,张謇就是利用这种潜势力吸引资本;利用这种潜势力成为士绅们的领袖,大生集团的一批精英,大多是他早期用“张状元”、“张殿撰”、“奉旨总理”这些桂冠结集过来的地方士绅;他在企业内部的主宰地位,不是由于投资数额而是由于他的这些由桂冠带来的潜势力奠定的;他甚至利用这种潜势力来扩大企业的影响,推销他的产品。

为了加强这种官场潜势力,张謇甚至会做一些与他平时人格相悖的事。1904年3月,清政府为了加强了对新兴资产阶级的拉拢,封张謇三品衔,作为商部头等顾问官。张謇在1903年5月15日的《东游日记》还说:“日本士大夫为官商,听其人之志愿,方为官则一意官之事,及为商则一意商之事。华士大夫则方官而有商略,方商而有官式”^⑧。本来,这种认识是十分宝贵的。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弊端,就是官商不分,官商结合,官商勾结,这不仅是官场腐败之源,也是中国发展现代工业和商业的巨大阻力。但是,面对现实环境进行实际选择时,张謇却抛却了这一金贵的认识,接受了任命。他认为,有了这个虚衔,会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增强在商界发言的力量。

他在日记中写道:“江海之臣,宦情久绝,忽被恩命,甚愧叨逾。顾官为新制,又系实业于经营实业界中,或者小有裨益,是则王命之孚为可感矣。”^⑨

二是依附彰显之势。张謇从办实业的第一天起,就与官府以及社会有关力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生纱厂是奉旨而办,从起步,在资金、设备、专利、减税等方面,不断向张之洞、刘坤一等封疆大吏寻求支持和帮助;张謇利用游学、游幕和短暂的仕宦之机,广泛地结交政、军、商、学各界名流要人,织就了一张由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构成的可依附的权势系统。这是构筑张謇地方权威的重要社会资源。比如,大豫盐垦公司约50万亩土地,就是张謇利用盐政总理的名义,移请江苏都督程德全委任张謇“测量绘图”,进而逐步加以占有。1913年底,因为要创设大生三厂,他利用农商总长职务之便与英国公使商定向好华特厂订购纱锭等,并委托汇丰银行代办国外汇款。^⑩在1915年春辞去农商总长职务之前,他还曾以“南通教育、慈善、公益”名义,一次就向北洋政府请领了15万亩荒地,而华成盐垦公司的成立,主要就是依靠冯国璋的撑腰。江苏省长韩国钧、通海镇守管云臣都曾从多方面为张謇提供便利条件。^⑪

三是周旋斗角之势。张謇晚年,军阀混战。张謇痛恨军阀混战,但为了苟全通海一隅之地的和平环境,当年以道抗势的棱角似乎早已挫钝。为了寻求各级政府的庇护和支持,他不但自己接受不同军阀政府委任的无足轻重的官职^⑫,还让张孝若先后出任直系政府的出国考察实业专使与驻智利公使(未到任),后来又让他出任直奉两系联合控制的“摄政内阁”的扬子江水道委员会委员长。1922年,张謇利用答谢各界人士为他庆祝70大寿名义,派张孝若先后到洛阳、奉天访问吴佩孚与张作霖,同时敷衍激烈对抗的两大军阀集团以图委曲求全。1925年,孙传芳就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势力扩张到江苏各地。张謇又不得不加强与孙传芳的联络,如写信祝贺“大捷”。这年冬天,孙传芳到南通,张謇设晚宴欢迎,并安排上了一道别出心裁的“华盛顿汤”,借以表示对孙联帅的良好祝愿。^⑬可见其用心之良苦。

西方资产阶级也与政府、军阀打交道,然而,他们把政府和军队看作他们的贸易对象,要他们身上赚钱;中国早期的资产阶级与政府和军阀

打交道,是把他们看作可依附的势力。前者体现了自身的独立权利、平等人格;而后者却是依附型的,失去独立人格的。像张謇这样的早期资产阶级,也企求独立,但是,中国的文化环境以及其自身的文化人格都决定了难以摆脱依附。好不容易有了一点以道抗势的胆量,又在严酷的环境中畏缩下去。

三、动力机制闭锁的所谓“自治”

张謇试图用以道抗势和权力抗衡交相使用的方式来推动现代化,但最终不能摆脱以道附势的选择。当张謇为抗势和附势交相为用费尽心机,还不足以使自己的力量壮大的时候,他并没有注视到一个巨大的动力源就在他的身边,那就是民众。反过来说,正因为他缺乏民众的理解和支持,他的奋斗才显得势单力孤,他才不得不重新依附和乞怜于官方和社会的世俗势力。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他根深蒂固的传统历史观和文化态度。

1. 两种不同的历史观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指出,当西方资产阶级征服中世纪的野蛮,创造新的文明的时候,创造者们最能心领神会的一个普通道理是:“领袖的任务是把他的同侪变成他的信徒;而把众多的人发动起来使他们朝着一个遥远的目标前进”^④,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近代西方人在这方面用足了脑筋,最终他们使与工业主义并肩而立的独立、自由的制度发展起来,强调人的自身利益性、独立性、自主性,于是开创了一个“上帝为人人,人人为自己”的局面,从而自发地将个人对于私利的追求转变为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促进。然而自由竞争的盲目性又导致周期性的危机。于是,西方的制度理性应运而生。制度理性的充分发育,是对人间权威的一种否定,天赋人权,生而平等从而得到制度的保证,使多数人的积极性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张謇对当时中国社会黑暗、民不聊生极为痛惜。因而矢志于改革这个社会。然而,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怎样调动民众,而是想到怎样以救世主的身份去救民于苦难,用圣德去感化民风,使民依顺。1906年,他在《记论舜为实业政治家》一文中说:人人尊敬的圣人舜做生意、种田、打鱼、发展工业,抓住机会获取利益,一年成“聚”,二年成

“邑”,三年成“都”,把农工商都团聚起来,安居乐业。舜完全是出于公心,如果舜是一个从私利出发的人,就不可能这样。舜的伦理形象感动了各方民人,使民风纯朴,地方丰饶。^⑤这里没有调动多数人的积极性思考,只有圣王个人为大家所作的无私贡献;如果说有什么多数人的思考的话,那也只是圣王的榜样、圣德的感化所产生的征服民心的力量,而导致民风淳化的理想社会的实现。这与西方精英们千方百计地要调动大多数人的积极性甚至潜在能力,共同朝着一个目标前进的思路有很大的差异。

正因为张謇如此思考问题,他是一个极其孤独的开拓者。首先,南通现代化进程中的千头万绪,基本上由他一人思虑设计。他说:“这种事业,我如不做,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肯负此责任也。”^⑥因此,他“抱着用世之心和创造事业的大志,一不求人,二不馁气,终日终夜,想应付解决的方法。”^⑦其次,南通现代化进程中的大事小事,凡他认为重要的,都得“事必躬亲”。连南通师范开学,厨房和厕所都是张謇亲自连夜举着蜡烛去布置。^⑧再次,南通现代化进程中的慈善公益诸事,都由他或一二兄弟奉献。他真正是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然而,张謇给人更深刻的形象是农耕社会中的“贤人”,像他一生所崇拜的“躬耕历山的舜”,是“孤高而全能”的圣人,而不是善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现代领导者。当然,他经常感到孤独,他说:“我假使有十个儿子,我一定叫他们每人都学会一件技艺来帮助我”。^⑨就是这样,他仍然是那种贵族式的思考,不轻易把同情的对象变为历史创造的动力。

可见,张謇的历史观与现代西方人的历史观有较大的区别。在现代化进程中,西方人想尽量抛却人间的权威,从而在一种抽象的对象物面前(如真理、法律、制度)达到人人平等,达到人的独立和自由,以充分发挥多数人的积极性;而张謇却是要尽力建树一个老百姓的救世主形象,建立一个崇高的圣王式的权威,这个权威就是他自己。他献出自己的一切乃至“皮骨血肉”,洒向苦难的人间,救助芸芸苍生。因而,在他眷顾的一方土地上,老百姓都是他的子弟,承他的恩泽而安居乐业。正因为老百姓是被动的受惠人,因而永远是依附型的。他这个人间的权威一旦消失,老百姓

马上就会失去依附的凭借,仍然回归苦难的深渊。

2. “民之分层”和“天赋之阶级”论

张謇的这样一种“救星”意识,莫基于他对“民”的一种理解。在张謇所生活的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育,个体独立性越来越强,封建“臣民”文化已经被彻底打破,已经普遍接受了“天赋人权,生而平等”、“平等、自由、博爱”的口号。但是,由于“中体西用”思想的左右,张謇头脑中“顺天应人”的权威认同方式没有打破,民主的“欧风美雨”很难完全渗透进他的人格结构。在他看来,“民”至少分成两个层次:其一,绅民。张謇在立宪运动中所说的“民”,指的是民间绅士和在籍官吏,“国会制度者,非尽人而参与国政之谓也。……于千万人民中,择其少数有程度者,畀以选举权;又于千百人民中,择其少数有程度者,畀以被选举权。……国会将来被选之议员,其大半必系曾有官职、有资望者”^④;其二,齐民。即广大普通老百姓。在张謇的指导思想中,百姓是没有主体地位的,这是因为“民智未开”、甚至“安愚习惰”^⑤,他们只是“教化”的对象,同情的对象,是需要像张謇这样的“强人”或“救星”赐于“利益”的对象。所以,低层百姓不构成张謇变革社会的力量。黄仁宇曾经指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低层社会反应的“迟钝”,其原因则是精英阶层对低层社会实际上存在着一种蔑视。“殊不知一个国家之现代化……无不需要我们在低层结构中创造一种各因素统能互相交换的局面。”^⑥

对低层社会的蔑视,突出反映在张謇晚年思想中的“天赋之阶级”论。他说:“智与愚、勤与惰、俭与奢,大都根于资性,则未富之前,各个人天赋之阶级也。”^⑦这与西方的资产阶级判若天壤,当西方资产阶级高扬“天赋人权”的时候,张謇却说“天赋阶级”。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他把自由解释为“干涉”和“服从规则”,把平等解释为“虽奴隶人不可忘其为同胞”,并认为这“是说平等之最善处”。^⑧从而进一步为他的“救星”意识找到了理论依据。

3. 自治:绅治的替代话语

1905年,张謇就已经接受了西方“自治”的概念,之后不久,他就把南通早期现代化的各项事业

统一到“地方自治”的名义下。按理说,他应该可以通过自治的民主理念,找到推动现代化的真正动力源,但是,由于他特有的“民之分层论”和“天赋之阶级论”,使他极为轻易地抛弃了自治中最宝贵的民治内核。

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说到:清末,地方自治实际是绅士之治。^⑨张謇的地方自治与费正清所说的情况有相同之处,即南通地方自治是由张謇为首的一二绅士治理,说白了就是他与他的哥哥张謇共同治理。他说:“窃謇抱村落主义,经营地方自治,……始发生于謇兄弟一二人,后由各朋好之赞助”^⑩。完全没有西方自治中人民自主、自决的民主内核,也失去了日本地方自治中人民议政、建议之权,留下的是不带民主血肉的地方自治的外壳,从而闭锁了地方自治应该开启的民众动力机制。

1920年,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张孝若,一眼就看出了南通自治不过是他父亲的一人致之,于是,他欲仿效西方“法治基础在议会,民治责任在议员,议会权能在多数”的做法,在南通建立一个真正具有人民自主、自决的自治会。他说,这个自治会“即代表南通全县人民之团体,所以谋南通全县实业教育交通各种事业之改进与发展。……其责任当南通全县人民共同担负。庶南通之事业与日月而俱长,不因我父而兴废。”^⑪张孝若的想法首先得到了主张“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的梁启超的支持。他写信给张謇说:“昨得睹南通县自治会报告书,颇有生子当如孙仲谋之感,想公当掀髯以笑也。”张仲仁则在给张孝若的信中说:按照张孝若的思路,“今南通之自治,将由贤人政治,而进为庶民政治矣;何幸如之。”^⑫

然而,张謇开始不能接受张孝若的倡言,后在张孝若的反复陈说下,勉强同意一试。时过一年,他说:“儿子孝若,年少资浅,近被地方公推,组织南通县自治会,其范围也如謇所办之事业。但彼由各团体之赞助,此只发生于一二人;彼为二十世纪世界之大潮流,此为前二十五年个人之小计划。抚今思昔,不禁惘然。”^⑬张謇显然认识到,儿子所倡导的建立在民治基础上的自治切合20世纪的世界潮流,而他本人所经营的“自治”,不过是个人意志的产物。但是,他的疑虑依然没有消除:“众人知识才力,一与否?不一有憎与忌否?有

能涵覆而救济之者否?非一日而先后左右其行者,有他变他患否?是皆可虞而当计及者。吾为吾南通自治会惧焉。饬颓然老矣。区区自试之心,日望传人;而又惴惴焉,虑或不胜传。”^⑩在张謇看来,民智未开,民众知识才力均不足以担当欧美式的地方自治。他希望他的事业后继有人,同时又不相信普通民众的知识能力,心中甚是担忧。事实上,所谓的民智未开,正是他不能放弃“追踪三代圣王,救民众于水火”的“救星”意识的主要阻碍,也是他走向现代民主的最大阻力。这决定了他在中国早期现代化途中,始终只是一个孤独的开拓者。

注释:

- ①①②③④⑤《张謇全集》第1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92、212~213、240、94、94~95、1、28、145、117、618页。
 ②章开沅,罗福惠:《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页。
 ③《论语·宪问》。
 ④《孟子·尽心章句上》。
 ⑤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0页。
 ⑥⑦《张謇全集》第3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36、789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页。
 ⑧[美]兰比尔·沃拉:《中国:前现代化的阵痛——1800年至今的历史回顾》,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页。
 ⑨宋书伟,孙立平:《现代社会发展研究》,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 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张謇全集》第4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39、462、74、95、444、439~440、26、457、458、465页。
 ⑲⑳㉑㉒《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85、494、527、686、889页。
 ㉓常宗虎:《南通现代化:1895-193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147页。
 ㉔《南通张季直先生逝世40周年纪念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127页。
 ㉕⑲⑳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1、58、309~310页。
 ㉖[日]驹井德三:《张謇关系事业调查报告》,《江苏文史资料选集》第10辑,第143、151页。
 ㉗⑳《第三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53页。
 ㉘⑳⑳⑳⑳⑳⑳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上海中华书局,1931年版,第358、93、352、380~381、479、480页。
 ㉙刘坤一:《刘坤一选集》第2册,中华书局,第883页。
 ㉚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12第4页。
 ㉛《通州兴办实业章·大生纱厂》,翰墨林编译印书局,1910年版,第4页。
 ㉜林明德:《评〈张謇与中国近代企业〉》,台湾:《国史馆馆刊》复刊第24期,1998年6月。
 ㉝《张謇全集》第6卷,第819页;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第324~329页。
 ㉞[英]汤因比:《历史研究》,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0~136页。
 ㉟《张謇全集》第5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51页。
 ㊱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书局,1958年版,第251页。
 ㊲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56页。
 ㊳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62~463页。

On the Contradiction of the Disposition of the Driving Forces to Push Ahead Modernization of China in the Early Period

YAN Chijun

(Administrative Personnel University of Jiangsu Province,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The process of how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disposed driving forces to push ahead the modernization drive in China in the early period was a unique interactive process involving the state, the local places and the masses. This process was full of contradictions. Taking Zhang Jian as an example of case stud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efect in the mechanism of driving force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drive in China in the early period……the failure to mobilize the broad masses of the people.

Key words: to counter the powerful with ethics, be attached to the powerful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prevailing moral principles, mechanism of the driving forces, blockade

(责任编辑:藏 峪)